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
出版规划项目

延安时期的 日常生活

任文 主编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

出版规划项目

延安时期的 日常生活

任文 主编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图书代号 SK14N037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延安时期的日常生活 / 任文主编.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2014. 5
(红色延安口述·历史)
ISBN 978 - 7 - 5613 - 7715 - 4

I. ①延… II. ①任… III. ①陕甘宁抗日根据地—社会生活—史料 IV. ①K269.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93733 号

延安时期的日常生活

任 文 主 编

责任编辑	巩亚男 张旭升
责任校对	杨 珂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西安市长安南路 199 号 邮编 710062)
网 址	www.snupg.com
印 刷	西安创维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 × 1020mm 1/16
印 张	19
插 页	2
字 数	243 千
版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613 - 7715 - 4
定 价	35.00 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刷装订问题,请与本公司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话:(029)85307864 85303629 传真:(029)85303879

“红色延安口述·历史”

编辑委员会

总策划	冯晓立	傅功振		
主 编	任 文			
编 委	薛义忠	石 杰	梁向阳	孙国林
	朱鸿召	张军锋	梁星亮	姬乃军
	刘卫平	田 刚	陈答才	王晓荣
	刘东风	冯晓立	傅功振	
参编人员	王 耀	王晓飞	王慧子	邓 微
	仝 蕾	巩亚男	庄婧卿	刘存龙
	张 双	赵虹波	雷亚妮	

编辑说明

“红色延安口述·历史”是一套以口述实录、回忆录、访谈录以及相关原始档案并配以历史图片为基本内容的史料集成。它试图以亲历者、当事人、知情者或者后代的讲述、回忆，来还原历史真相，呈现延安十三年的辉煌，从而改善当代人对“符号化”延安的僵化认识，再现一个本色、真实的延安。入选文章均来自已出版的图书、杂志、报纸，酌量选录地方党史办公室、政协文史机构等征研的资料。

丛书所选文章注重大历史背景下个人独特的经历和感受，尤重对历史细节的挖掘和梳理。丛书内容虽以回忆、口述等形式呈现，但其较强的故事性、可读性，有益于对当代读者，特别是对青少年读者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进一步弘扬延安精神，具有积极的现实作用与意义。

丛书共 17 种 21 册。内容包括口述实录、回忆录、访谈录、重要的档案材料及代表性研究文章。口述实录、访谈录与回忆录前均设置了对口述人或回忆人的简要介绍，并突出介绍口述人或回忆人在延安的工作或生活经历。

所选文章中，因个人当时的见闻条件、历时记忆在一定程度上的失真以及可能附加的主观因素等，讲述人或作者对历史事件的忆述不一定完全符合已逝的客观真实，且不同的亲历者对同一事件的细节叙述也常稍有出入，这一方面反映了历史事件的复杂

性、多元性，另一方面也说明历史应该是“人的历史”，不能只有一种“写法”或“说法”，更不存在“唯一性”，这样才能更趋历史“真相”。为尊重原作，编者收入时未强求统一，多以“编者注”提醒读者注意。

入选文章写作时间跨度从上世纪30年代到本世纪初，每篇文章自有其文字风格和时代的语言习惯，收入本丛书时，除特殊情况外，皆尊重原文，不做改动；原书专名（人名、地名、术语）及译名与今不统一者，多未做改动。如确系作者笔误、排印错误、数据计算与外文拼写错误等，则予以修正。标点符号、数字用法等，依据现有出版规范做了统一处理。除特殊情况外，原文篇后注或行文注统一移作脚注，文献著录稍加统一。

由于我们工作经验不足，或翻检资料有限，或水平、认识有限，其中可能存在讹误或差错，敬请方家、读者批评指正。

作为一套大型汇编丛书，涉及文字与图片等著作权联系方面的工作难度很大，我们进行了多方努力和联系，但仍有部分作者信息不明或原工作、生活地址变动而无法联系，希望版权人或版权继承人见书后与我们联系，以奉稿酬与样书。

谨以“红色延安口述·历史”的出版，向革命先辈致敬！

“红色延安口述·历史”编委会

2014年3月

延安日常生活指数（代前言）

朱鸿召

延安十年（1937—1947年），将一个陕北小镇打造成革命的圣地，并因此而改变了几代中国人的生命历程，改写了20世纪中国社会的历史篇章。走进历史的生活是崇高的，但融入生活里的历史却往往是繁杂琐碎的。而正是在繁杂琐碎的日常生活指数里，隐含着吉光片羽般的历史真谛，闪烁着人性的光辉。

一、人口与性别

人，创造了人间的奇迹；同样是人，创造了人类社会的历史。战争年代在医疗卫生条件极不发达的地区，人是一切资源中最可利用的因素，也是最宝贵的因素。延安，自古就是边陲要塞，位于汉族与匈奴等北方少数民族交流杂处的前沿地带。清末以后，这里战争频仍，十室九空。1935年10月，红军主力部队长征到达陕北后，当务之急就是“扩红”——招募青壮年人口参加红军，补充因长途跋涉而锐减了的部队编制和战斗力。此后的十余年间，陕北延安采取多种方法，大量吸引人才，更大量地招募移民人口。革命圣地延安的历史，就是由他们直接参与打造的。

1937年1月，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共中央随红军主力部队进驻延安。当时，延安城本地居民大约3000人。“在露天集市上，农民和商贩出售肉、蛋、蔬菜和其他食品，还有一些小商店、小吃店和几座有名气的饭馆，仍旧照常营业。总之，延安呈现着一片差不多是正常的和平的生活景象。”而此时部署在延安的共产党守备部队实有兵力总计4000—5000人，共分为5个团。1938—1939年边区与国民党军队开始发生摩擦，从前线撤下3个团来加强守

备部队，使其兵力增加到6 000—8 000人。^①

1934年，红军开始长征出发时的实有人数是75 000—81 000人，战斗部队编制为5个军团。所有参加长征的人，身边带有大约可以用两个星期的给养，主要是大米和食盐。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红一方面军剩下7 000—8 000人，其中正规部队战士约5 000—6 000人。1939年，在陕北的由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总数是16 000—19 000人。1943年8月，在延安的党政军人数有3万人，老百姓约1万人。^②这相当于当初1937年延安市区人口的16.67倍。

1943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任弼时就如何看待知识分子问题发言，其中介绍：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4万余人，就文化程度而言，高中以上占19%，高中占21%，初中占31%，初中以下约占30%。这些知识分子到延安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培训，就被分配到陕甘宁边区或其他根据地工作，部分人留在延安工作。

1946年10月，陕甘宁边区政府选举委员会提供的确切统计资料显示，延安市区老百姓人口总数为12 370人，陕甘宁边区人口总数为1 593 950人。这是不包括党政军学等“公家人”的，同时，据陕甘宁边区民政厅统计，1937—1945年间，边区共接受移民63 850户，人口266 620人。外加5 000多还乡难民，人口总迁移量达到316 620人。安定县（今子长县）4个行政村原来只有173户，到1941年几年时间就增加到288户。^③大生产运动中被评为先进模范村的延川县刘家河村，1937年只有5户人家，62口人，到1943年就增加到12户人家，105口人。^④在这十年里，延安及陕甘宁边区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持续在5%—20%之间，属于典型的非自然增长状况。在1946

①〔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李亚红译，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7、241页。

②《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1943年8月15日。中央档案馆存。

③谢觉哉：《边区人民生活日趋改善》，载1941年9月22日《解放日报》。

④《刘家河村被誉为丰衣足食模范村》，载1943年9月23日《解放日报》。

年的边区农村总人口中，全劳力就高达 308 760 人。这种以移民为主体的人口的迅速增长，为农业生产和兵力补充提供了可靠有力的保障。

处于战争环境下的延安，其边区人口工作的指导思想是发展生产，提高出生率，降低死亡率，反对堕胎，加速人口自然增长率，大力吸收各类人才，大量招揽各种移民，增加人口。1943 年 2 月 22 日的《解放日报》载文说：“我们不怕来的人多，愈多愈好，我们只怪历史上给延安县遗留的人口太少，给我们发展生产许多困难。假如在两三年后，延安人口达到 10 万以上，那我们的工作将是另一番现象。”

上述边区人口中，农村老百姓无论是原有农民，还是招揽来的移民，其男女性别比例大体上是平衡的。1945 年 10 月边区选举委员会统计的边区人口总数中，男性 84 400 人，女性 75 000 人，男女性别比为 1.13: 1，属于正常状态。可是在延安革命队伍里的“公家人”中，男女比例却严重失调。

1938 年前后，延安革命队伍里的男女比例为 30: 1。几年过后，到 1941 年前后，男女比例稍有缓解，为 18: 1。再过几年情况向更好的方向发展，1944 年 5 月，男女比例为 8: 1。^①这个数字比例关系基本一直维持到 1946 年开始逐渐撤离延安。

形成这种严重失调的男女比例的原因，是长征到陕北延安的革命队伍，除了 50 名女同志，其他全部是男人。一大批青年学生为了抗战，从沦陷区、国统区和大后方奔赴延安，献身革命，才缓解了革命队伍里倾斜着的男女性别比例关系。“舞会在当时之所以特别盛行，除了跳舞可以娱乐身心、有利健康的原因之外，还因为参加跳舞的舞伴都是妙龄女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为补偿大多数高级将领由于军务倥偬而耽误的青春，鼓励和帮助他们解决婚姻问题。……

^① 朱鸿召：《延安文人》，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88 页。

当时延安的高级领导人，师级以上军官中80%的人都是在这一时期恋爱、结婚、成家、生子，延安对他们是一种温馨、甜蜜的回忆。”^①

把人当作一种武器，一种工具，一种资源，去驱使，去利用，去开发，可以创造出人间的奇迹，却同样会制造出各种人间悲喜剧。

1938年9月，时年19岁的孙承勋（何满子）经武汉到延安，进入陕北公学高级班第六队学习。此前在武汉抗日救亡活动中，他认识的一位志同道合的女学生郭维琼，同样也到了延安，进入安吴堡青年训练班学习，他们之间保持着亲密的通信联系。大约半年后，他忽然接到她的告别信，说组织安排要她陪同一位老干部到晋察冀边区前线。“‘陕公’与安吴堡青训班常有人来往，我得知一些情况，知道我们的关系完了。”^②此事对他打击很大，他感到再也不能待下去了，随即离开延安。半个多世纪过去后，他回忆起这段经历和这件事，以为自己“由此而学懂了一点人生的、社会的内核性的东西”，“看到了一个胚胎，一个雏形，由此而领悟了社会的结构和运作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虽然“这点获得极难用文字表述”，但对自己人生的影响却是至深至远的。“我真切地自我审察到，从此就添加了一些虚无气，对生活的执着也添上了虽然是轻度的怀疑和渺茫的色调。这对我以后的生涯影响极大。我常为克服附在我身上的这个消极性幽灵而付出精力，到底没能尽根制服庄生式的对人生的玩赏态度。”^③兴许怀疑与玩赏的人生中会伴生出几分旷达与超脱，毕竟疼痛透骨，令人耿耿于怀。

二、时间与食谱

时间是人类共同拥有的资源，人们用不同的态度对待时间构成了这个世界不同的丰富多彩的文化。每一种文化都有它自己独特的时间指纹。认识一个民

① 梅剑主编：《延安秘事》下册，红旗出版社1996年版，第445—446页。

② 何满子：《跋涉者——何满子口述自传》（吴仲华整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6页。

③ 何满子：《鸠栖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7—138页。

族，一个时代，一个社会，其实就是去认识它如何使用时间。延安革命队伍里的时间也经历了一个无序到统一的过程。

长征过来的革命队伍里，计时的钟表是非常珍贵的稀罕物件，只有战斗指挥员才配有。集体生活作息时间，起床、熄灯、一日三餐都是以号角为指令的。令行禁止，个人无需计时。只有担任首长警卫任务的战士们，需要计时轮换岗位，便以焚香为准，一个小时大约一炷香。而一些学校的作息时间，干脆以领导者或值勤者观测太阳高低，日暮晨昏为标准，随意性很大。遇到集体活动、庆祝盛典、群众集会，也并无定时，什么时候主持其事的领导人到场，便什么时候宣布开始。这在革命队伍里一般战士或工作人员并不觉得有什么妨碍，相反，领导人没有到场前的时间里正可以互相“拉歌”，热闹一阵子呢。

但因为有了奔向延安的知识分子，便感觉到了落后和不习惯。曾经留学法国近十年的陈学昭就公开批评延安，“开一次会，要是有几十个人的话，等待开会的时间往往可以和开会本身的时间占得差不多，就是说：两小时的会，要等待两小时。听报告也是如此。我的经验是听报告两小时的话，等待了一小时半到两小时，就已经感到疲乏，而不能集中精神去听报告了”。^①也有领导同志偶尔号召大家遵守时间，但大家已经相习成风，没有时间概念，或时间概念淡薄，彼此遵守的只有革命队伍里的号角和领导者的指令。因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一个把自己所有活着的生命都献给了革命事业的革命者，^②是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的，作为革命队伍的一分子，其一切行动都听指挥。只有那些将自己生命当作个人财富，或者是更广阔的人类财富的知识分子们，才觉得“不重视时间，不遵守时间，不抓紧时间，也就是浪费时间”。

这是两种对待时间的不同态度，日常生活中便产生了心理矛盾和思想冲突。随着奔向延安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他们对延安革命队伍里的时间浪费现象也

① 陈学昭：《时间》，载1943年11月16日《解放日报》。

② 通常为两种人，其一是职业革命家，以革命为自己的人生信仰和终生活动；其二是那些对革命要求非常低浅，本身就对生命没有什么感觉和想法的人。

就意见越大。“在延安我们缺乏足够的钟表。即使有钟表，亦无标准时间，往往相差到一两个小时，以致开会或听报告总不能按时到齐，前后浪费很多时间。”^①钟表不能普及，那么，最可行的办法是制作日晷。1942年8月28日《解放日报》报道，边区数理学会的孙桐计算太阳与时间的对数，延安自然科学学院物理系江天成，校审并设计出石质日晷。然后，由自然科学学院、边区政府和延安市政府资助，翻刻制作出两个大的石质晷，分别安置在自然科学学院内和市南门外新市场沟口。^②在当时条件下，此举堪称是对两种不同时间态度的最佳调和办法。随即，延安的很多单位，如杨家岭、中央党校、马列学院等也都陆续安装了这种形式的计时工具——日晷。

其实当时在延安的中央领导人中，尤其是先后从苏联回来的领导人，不是没有钟表，而是缺乏一个统一的时间标准。1944年5月，从晋察冀边区到延安帮助建立广播电台的英国人林迈可（Michael Lindsay）就发现了这个问题。他后来回忆说：“我们初到延安时，那里还没有标准时间。有些单位使用中国东部的华东标准时间，有些单位则使用华中时间，而延安地方政府则在他们的院子里安上一个日晷，时间是以太阳移动而决定的。这样多的不同标准时间当然会引起混乱。”由于他的工作是建立电台，负责接受并联系外地电台，所以必须要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时间。于是，他致信毛泽东。“结果毛泽东先生让他的一位秘书给在延安的各机构打电话，询问使用什么样的标准时间最好。过了几天《解放日报》登出了一条新通知，规定延安就使用所处时区的时间，即中国中部标准时间。”^③

延安当时不多的钟表都在中央领导人手上，他们分别从南京、武汉、重庆、莫斯科等地来到延安，然后各自主持某个部门的工作，便使得不同的单位使用

① 江天成：《延安日晷与地方时》，载1942年9月30日《解放日报》。

② 当年安置在延安自然科学学院的日晷，1947年3月为躲避国民党进攻，曾经被埋藏在地下。1953年被重新挖掘起来，并被征集为革命文物，现保存在延安革命纪念馆。

③ [英]林迈可：《八路军抗日根据地见闻录——一个英国人不平凡经历的记述》，杨重光、郝平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101页。

不同的标准时间。而毛泽东本人，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整个地将白天与夜晚颠倒过来，特立独行地按照自己的生活习惯和方式使用着时间。

用行政的办法统一了标准的时间，林迈可在与外界交往的过程中感觉到方便多了。对于延安革命队伍里的一般战士，以及奔赴延安后在整风运动中接受革命洗礼的知识分子，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关于时间的概念依然是模糊的。月有阴晴圆缺，石质的日晷岂能承受过多的苛求？在延安革命队伍里，过着供给制集体生活的人们，最严格的时间作息标准，其实是食堂一日三餐或两餐的开饭吆喝声，或梆声，或哨声。

1938年秋，陈学昭以《国讯》旬刊（黄炎培主编）特约记者身份从重庆到延安，开始被安排住在中央交际处招待所。吃饭时间是，早饭：8点左右，干饭；午饭：11点左右，稀饭；晚饭：15点左右，干饭。

“三顿饭在六七小时内吃完，只觉得一天工夫吃饭的时间占去大部分，因为饭与饭之间的距离太近，常常把工作打断。三顿饭都是小米，菜呢，都是南瓜。……自从我到后，他们为优待外来的参观者，为了外来的人一下子不能习惯于吃小米、素菜，每次都特地给我烧大米饭，另加一只葱炒蛋。”她写的报道中记述着：“说到吃，一般人都吃小米，那是外边大家都知道的。在冬天，蔬菜只有白菜、豆腐、豆芽菜、红萝卜、白萝卜、洋芋、粉条，荤菜只有猪肉，及猪身上的一切，羊肉，与鸡。牛肉呢，难得有出售，那是死了的牛的肉。鸡蛋绝对没有，因为天太冷，鸡不下蛋。现在，初春的美丽季候，只有菠菜，白菜绝对没有了，其他菜类与冬季的一样，不过荤菜增加了鸡蛋而已。”^①近代陕北灾荒连年，几万人的革命队伍能够解决温饱问题，已经是了不起的事情了。

延安马列学院坐落在蓝家坪的半山坡上，名曰学院，其实只是几排窑洞，周围没有围墙。每排窑洞前面有一块平坦的空地，可供学员读书、吃饭。学员四五个人住一个窑洞，洞内放一条桌，供晚上点灯照明读书用，没有椅子。“学

^① 陈学昭：《延安访问记》，香港北极书店1940年版，第81—82页、第216页。

院的生活很有规律，读书、上课、讨论、就餐、睡觉均有严格的时间规定，以哨为号。学员吃饭一般都到最下面一排窑洞伙房去打饭，一个小组一脸盆菜，大家蜷着腿围坐在地上吃。”^①一位学员1938年12月进延安马列学院学习，他回忆当时学员生活待遇是：每人每天1.3斤小米，1斤青菜，3钱油，3钱盐。每年发单棉制服各一套，生活是有保证。每月还发一点津贴。^②另一位学员1939年3月进马列学院学习，他回忆当时的学员生活待遇和伙食情况与上面有些出入：“当时的生活很艰苦，每日小米（糠不少）1斤，蔬菜1.5斤，油3钱，盐5钱。每周一顿二米饭（小米掺杂大米，引者注）或馒头，菜汤上漂几片肉，节日可吃到一顿大米饭。每月零用钱1元。”^③1940年大生产运动后，改善了学员的伙食，能够吃上馒头，菜里的肉片也多了。

大生产运动中，各单位多种经营，养猪、种菜，并创收，改善生活。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原来每天伙食的主食是小米，现在变成面食，并且逐渐地每周还可以吃上一餐大米饭。这是他们一周的食谱：

星期一

早饭：羊肉炒萝卜，炖牛肉、豆腐、白菜、粉条，西红柿汤

午饭：面条

晚饭：素炒青菜、炖白菜、猪肉丸子汤

星期二

早饭：羊肉炒土豆、炒菠菜、豆腐汤

午饭：疙瘩汤

晚饭：油炸丸子、汤

① 段苏权：《一生奋进总思源——忆延安马列学院》，见吴介民主编《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17—218页。

② 郭敬：《马列学院的生产劳动》，见吴介民主编《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82页。

③ 段苏权：《一生奋进总思源——忆延安马列学院》，见吴介民主编《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17—218页。

星期三

早饭：猪肉炒白菜、卷心菜汤

午饭：面条

晚饭：煎肉丸子、炖南瓜、西红柿汤

星期四

早饭：羊肉炒土豆、炒菠菜、豆腐汤

午饭：疙瘩汤

晚饭：色拉、裹面油炸茄子、卷心菜汤

星期五

早饭：牛肉炒白菜、西红柿汤

午饭：面条

晚饭：蒸鸡蛋羹、南瓜甘薯泥栗子、萝卜汤

星期六

早饭：猪肉炒白菜、白菜豆腐汤

午饭：疙瘩汤

晚饭：炖菜、蒸南瓜、醋拌凉菜^①

该校学员都是日本俘虏，为了体现优待政策，伙食是上乘的。但毕竟大生产运动解决了革命队伍的温饱问题。不久，当地老乡的生活也改善了，街上的饭馆里可以买到大米饭、馒头和面条，以及肉食菜，各机关学校食堂虽然还是以小米为主，但副食品花样多了，一天可以吃上一顿肉。

三、货币与物价

延安革命队伍里实行供给制，作为一个“公家人”，一般吃住用全部由公家按照不同的级别等差无偿供给，个人需要购买的东西很少，除非私自给自己或邀几个朋友下馆子加餐开荤。但作为一个国家的雏形，延安时期仍然发行货币。市面流通的钱先后有“苏票”“法币”“光华券”“边币”“流通券”等

^① [日]香川孝志、前田光繁：《八路军中的日本兵》，张惠才、韩凤琴译，长征出版社1985年版，第54页。

几种形式。由于有了这些不同的钱币，便带来人们生活中物价的涨与落，以及生活水平的好与孱。

最初红军带到延安的钱是“苏票”，即“苏维埃国币”，又称苏币。早在1932年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创立，7月7日开始发行统一的新纸币“苏维埃国币”，面额为一元、五角、二角、一角、五分，共五种。苏票一元与法币一元相等值。“1934年10月红军长征时，毛泽民（时任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引者注）奉命携带苏维埃国家银行的160多担黄金、白银和苏币，组成特别大队，保证红军给养；同时还兼负管理沿途运输、接收打土豪的财物、筹粮筹款等工作……”^①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以苏维埃国家银行西北办事处的名义，继续发行过一些苏票，但流通有限。

1937年9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驻西北办事处更名改制为陕甘宁边区政府。随之，苏维埃国家银行西北办事处也相应地改名为陕甘宁边区银行，承认并流通法币，逐步收回苏票。

法币，是指1935年11月国民政府实行币制改革，废除“银本位”制度，“废两改元”，改用统一的纸币流通，规定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三大银行（1936年2月增加了中国农民银行，共四大银行）所发布的纸币为法定货币，即“法币”。1938年8月，边区银行发行了小面额的“光华商店代价券”，简称“光华券”。

一年后，国民政府得到报告，大为光火，责令严查。1939年4月7日先由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致电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财政部部长孔祥熙：“查陕甘宁边区政府辖境内法币信用甚高，流通亦畅，惟零星辅币万分缺乏，影响物价之提高，有碍小民生活。经当地商会、农会等向边区政府环请，准许光华商店发行二分、五分、一角之代价券。原系暂时权宜便民之计，而其流通范围只限陕甘宁边区。发行以来，因准备充足，深得人民信仰，并无武装

^① 余伯流：《中央苏区经济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5页。

部队强迫行使情事。尊座听得报告，完全与事实不符。”^①

次日，再由边区政府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天水行营主任程潜呈文，重申上述原由。4月10日，边区政府又一次致函国民党西安行营：“查边区境内，法币信用甚高，流通亦畅，惟于开始推行之期，流通市面之法币，多系五元、十元者，而零星辅币，万分缺乏。……农民则因需用品之不易购到，宁愿物物交换，不肯接受法币。”^②边区银行经托请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向有关方面交涉，结果由中央银行兑换少量辅币，同时由国民政府支付给八路军军饷，同意辅币占十分之一。这样，市面上仍然小票大缺，多用邮票找零。于是，便有了“光华券”。

光华商店由原边区政府贸易局改制而成，归属于边区银行经营管理，是当时延安最大的一家商店。“光华券”票面为五角、二角、一角、五分、二分共五种，作为法币的辅币，开始只发行10万元，持券者可以随时到光华商店如数兑换法币，信誉甚好。1939年国民党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后，自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形成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受到破坏，国共两党关系大不如前。入冬以后，延安物价猛涨，法币狂跌，陕甘宁边区财政供给出现困难，于是在开展大规模生产运动的同时，为了调剂金融，周转财政，遂扩大“光华券”的发行，至1939年12月共计发行31万元，至1940年12月共计发行311万元。1941年1月，开始试发行“边币”，并增加发行票面为七角五分的代价券，连同前面发行的五种，“光华券”共计六种。到1941年12月，共计发行4 300 725元，其中边币41 600元。

“边币”是陕甘宁边区银行发行的正式货币，与“光华券”一样，票面上都标以中华民国纪年，但大红着色，妇女纺纱、羊群等图案已经具有鲜明的解放区文化特色。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1月28日边区政府委员会决定独立发行边区自己的货币，1月30日颁布法令禁止法币在边区范围内的流通。

① 参见《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一辑，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230页。

② 参见《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一辑，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231—232页。